

少年行

陈白露



少
年
行

陈
白
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少 年 行

SHAO NIAN XING

著 者：陈白尘

封面设计：叶 雨 马少展

责任编辑：胡 翠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787×960毫米32开本 6.5印张 95,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02·129 定价 1.40 元

ISBN 7-108-00030-X/I·10

目 录

1	“破题”
2	第一章 姜氏私塾
2	一、进彩巷
14	二、“茶叶棒子”与“城头 大战”
27	三、《包尔温读本》
38	四、别矣，进彩巷
52	第二章 初中生
52	一、李更生校长
63	二、文艺殿堂远眺
77	三、爱情与革命
90	四、毕业前后
104	第三章 “野鸡”大学
104	一、上海滩
115	二、文学与革命
126	三、“四·一二”以后

136	第四章 象牙之塔
136	一、上海艺术大学
148	二、《断笛余音》前后
158	三、“鱼龙会”及其尾声
171	第五章 “无产青年”
171	一、南国艺术学院
182	二、“拉丁区”
193	三、“南国风光”

“破题”

寂寞的童年，以一顿打屁股而结束，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所谓“少年期”。但少年期的定义含混得很：过去的说法是：“自十四岁至二十一岁，与中学教育相当之时期”。而今“年轻化”了，说是“从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童年过渡到青年阶段”便叫“少年期”，亦称“青春期”云。按前者的说法，我被打屁股之次年才十二岁，尚不够少年之格；依后者呢，我十五、六岁刚进初中，我的少年生活要从中腰斩，也不象话。不得已，只好“各取所需”，以后说为头，而以前说为尾；也就是从1920年我十二岁去进彩巷读书起，到1928年夏离开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为止这一段读书生活算作我的“少年期”吧。这自然有点折衷主义之嫌了。但也没有别的法子。——以上算是“破题”。

第一章 姜氏私塾

一、进彩巷

1920年春，我穿戴齐全——穿上马褂，戴上圆盔缎帽，挟着书包，跟在父亲身后，走进我第四位老师姜先生的杏坛所在地进彩巷。这条小巷大概鲜为人知。它位于东门大街南侧，在纪家楼西、空心街东。其南端略作西折然后再往南，与都天庙街相接。但从西折处往西，便是空心街的中心了。巷子北端进口处很窄，仅容二人侧身而过。整个小巷只有七八个门户，但较突出的仅有两家，都处于巷子的中部：即西侧的韩举人家和东侧的郁二奶奶家了。韩举人家已经中落了，虽灰黯破旧，规模仍在。巷道至此宽

阔，门侧两只石鼓犹存；门上油漆脱落已尽，而木质很好；尤其是常闭的双扉，有八尺来宽，很是气派。其对门稍南，便是郁家的黑门楼，规模气派要小得多，也年轻得多。但它为了使得大门向南，便使巷道凹进一块，形成一个所谓的“钥匙湾”，于是大门之前便有个方丈之地，并且使对门的墙壁成为它的影壁。这可是韩举人家所不及了。据《淮阴市地名录》说：“巷内墙壁曾绘有油彩画，故名”。这彩画我不曾见过，据猜想，不出乎韩、郁二家了。但韩家没有影壁，郁家虽有影壁，却未听说他家出过显宦，只好存疑了。

父亲领我进了郁家的黑漆大门，在过道里便听到一片诵读之声。穿过过道，现出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北边正房三间，是房主人——寡居的郁二奶奶和她的女儿、媳妇所居；东西各有两间厢房，我听说过是洪本炎一家所住。而过道之旁、亦即与正房相对处，便是诵读之声所出的姜先生的私塾所在了。

这是两大间没有间隔的厅堂。一排木格子落地长窗把读书声关在里面。父亲推开一扇窗门进去，读书声突然低了下去，我可紧张了。抬眼偷看，只见满厅堂里密密麻麻排了四、五排书桌；

每排有五六个学生，都把眼睛盯着我们。这几排书桌之前，迎面吊着一张巨大的黑板，并且还有粉笔。它使我迷惑不解了：这是一个“洋学堂”么？我父母是反对洋学堂的，我自然也受感染。

这时我父亲已经和姜先生分宾主坐下了。原来这厅堂的后面还伸出一个“老虎尾巴”的内室。西壁是姜先生卧榻之所，而靠东壁，还有一桌一几，长几上边有香炉、烛台，香炉后还竖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牌，我这才安了心。这时我父亲已献上大红封套所装的“束脩”，便命我点上香烛，然后向圣人牌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向老师叩了两个头，姜先生也作揖还礼。礼毕，父亲便告辞而去，我独自留下了。现在想来，还觉惭愧：这时已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了，也就是孔家店已被打倒的时代，我还在尊孔读经，其思想之反动可知了！

父亲走后，姜先生盘问我读过什么书。我如实回答：《四书》都读过，但未开讲；在汪维洲先生处还读过《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等等，自以为学有根底了。但姜先生却问我：学过历史、地理和算术么？我瞠目不知所对，于是姜先生安排我坐在他所谓的丙组学生一起。我看一看甲组学

生大概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我自然不够格；乙组的学生呢，大概都在十岁以上；丙组学生则都是八九岁以下的小“萝卜头”。把我放在丙组，从身材说倒是“鹤立鸡群”了，可是从智力说，真是“耻莫大焉”！

这时学生们在陆续背书，我没事干，便在座位上端详起老师来。他比我过去三位老师都年轻得多，约莫三四十岁之间，估不透。他四方脸，紫黑脸膛，浓眉大眼，没有一点书生气味，而他身躯高大，虎背熊腰倒有几分武夫模样。我竟怀疑他是个种田的出身。后来我逐步明白：姜老师大名镇淮，字藩卿，是涟水县梁岔乡人氏，果然是位乡巴佬。

到10点钟，背书完毕，姜先生从他的宝座——大黑板之侧、厅堂与内室交界之处、可以统观全体学生的书桌后椅子上起身，站到黑板之前上课了。课，按三个组分别上，黑板也一分为三，学生坐位也依组按纵行排列。开头先上丙组。这天丙组先上算术。姜先生为了我先教了阿拉伯数字。这玩意儿虽然陌生，并不难学，因为它与我们商店用的“苏州码子”相似，只是苏州码的“五”和阿拉伯数字的“八”易于相混而已。至于加减法，即

使是四位数，我用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我是商人之子嘛！因此第三天上，我便背起乘法歌了。丙组还有门课，叫“缀法”，对我也是新鲜玩意儿。但经老师一说，也明白了。那天题目中有“清明”二字，要我们缀成句子。我想，这有何难，提笔便写下“冬至百六是清明”七个字，送给老师，才两分钟。姜先生见我第一个交卷，看了一眼，便问：“你读过《幼学琼林》，可懂这句话么？”我说：“从冬至到清明，经过七个节气，正好一百零六天。”他笑一笑，没说什么。但第二天便把我升到乙组去。只是让甲组的一个大同学帮我补习乘除法。姜先生既对我刮目相看，我对他的印象也为之一变。同时也感到汪维洲先生虽没好好教我的书，但这本《幼学琼林》却是在他手下背熟了的。它的开头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有关天文、地理、历史以及成语、掌故、生活常识等等，确比《四书》之类对我更有用处。

升到乙组以后，在学习上又打开了新天地。《四书》之类虽然照样读、照样背，却也增加了国文和算术以至历史、地理等学科。从此，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大地原来是个圆球，太阳和

月球的关系，日蚀和月蚀的由来；也知道了“英灭缅甸”、“法占安南”、“日据台湾”以及“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还知道美国有个华盛顿、法国有个拿破仑、德国有个俾士麦；至于中国有位孙中山，那是早就知道了。国文课自然还是读古文，于是《陋室铭》、《醉翁亭记》以及《祭十二郎文》，也都背得滚瓜溜熟。什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什么“环滁皆山也”，以及“阿兄归矣，犹屡回头望汝也”这些名句，就是此时记住的。而因此，我对作文也颇感兴趣了。尤其是记叙文，凭我两年逃学生活中的见闻，也凭我从读过的那些乌七八糟小说中获得的修养，下笔虽未及千言，也“庶几乎”了。特别是结尾，我已跳出当时一般惯用的“归时已万家灯火矣”那老套子，这更获得老师的赏识。但我更高的兴趣则在算术课，觉得“四则应用题”可以启发我的思考，更有趣些。因此我这一门课的成绩也最优。大概也因此之故吧，姜先生在这年年底，便将我从乙组排尾提升到排头，荣任乙组组长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某个早晨起，我们的背书课由甲组组长朱立本代庖，姜老师不知去干什么了。约有十来天之久，才恢复原有秩序。但次

日10时上课，姜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怪字：
ㄅ、ㄉ、ㄇ、ㄈ、ㄤ。

除了最后一个是当时“万”字的简写以外，其余都不知为何物。老师说：“这是‘注音字母’。三个组的学生都要学！前年，民国七年（按：即1918年）教育部就公布了；今年又改订过，共四十个字母。今天先学五个，要读成这样的音：‘伯，泼，莫，佛，物，’……”

于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把四十个字母都学会，而且能为汉字注音了。这时我们也才知道：那十来天姜老师一早出门，原来是自己学习注音字母去了。当时教育部推行注音字母，强令所有的学校国文老师都去培训，但有些老师耻于“下问”，偏不肯去。我们的姜老师，虽因属私塾教师，不在培训之列，却自动要求参加学习，甘于先当学生，然后再来教自己的学生，这可是旧社会闻所未闻的事！

时至今日，我还不敢对姜老师作出应有的评价。在“五四”以后，他还尊孔读经，还用戒尺施行体罚，当然算不得现代的教育家，更说不上是先进人物。但他教学生以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甚至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也算先进的事物），

除了音乐、美术、体育课程之外，他所设课程也差称齐备了。而他教的三个组，也略等于小学六年以至包括初中的课程。据我所知，从这姜氏私塾出去的学生，考进中学的很多，后来进入大学的也不乏其人。淮阴知名人士黄泮香，就让他的儿子黄永增、永勋先在这儿读完小学课程；经允文也算是淮阴城中饱学之士吧，他的子侄经绍澄、绍煊也先从姜老师读；他们以及朱立本等，都和我是同时期的学生，后来都考进了大学。那末，说姜老师是在一个特殊时代，以一种特殊方式从事教育事业、并以培育人才为己任的优秀教师，当非过誉吧？

当时的淮阴，教育事业很不发达，小学校更少。市民对这种被称为“洋学堂”的小学校更充满不信任甚至反感；而一般私塾老师，大都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如我的顾、万二位老师辈，也难于适应处于变革中的社会要求；于是以“改良派”面目出现的姜氏私塾遂应运而生！它的存在既消除了市民们对“洋学堂”的不信任感，又填补了小学校不足的现象，是从旧私塾过渡到新式教育的桥梁！在我进了中学以后，淮阴城里出现了许多自称为“改良私塾”的学堂，一直延长到抗战爆

发，历久不衰。这种所谓的“改良私塾”，其实都是以姜氏私塾为楷模。而姜老师看见后继有人，他自己——可以说是“改良私塾”的创始人，却应聘去涟水朱楼中学任教员兼教务主任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改良派”！

第二年，我已是乙组组长，对姜老师愈加尊敬了。姜老师全家都在原籍，他是单身在淮阴教书的，我因此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赶到私塾，都是第一名。当我推动格子窗门时，姜老师便习惯地问：“是增鸿吗？”我于是走进那老虎尾巴里，提了水壶，拿了水筹子和零钱，为老师打开水、买早点去了。当老师盥洗毕、和我一起吃完早点之后，同学们才陆续到来，而我又抢个第一名去背书了。此外，姜老师有些事务工作，比如每月向涟水家中汇家用等等，也是委派我办。“有事弟子服其劳”嘛，我颇引以为荣的。特别是去邮局汇款这一重任，更是非我莫属！因为当年邮局汇款，手续特别繁琐。先要填写汇款单：收款人、寄款人的详细姓名、地址要填写清楚，不得涂改；汇款数额更要每字大写，不得有误；是否要汇款回执，也要填写明白。这要花上十来分钟，因为都是毛笔正楷书写的。第二步，我要垫起脚尖，将

汇款单、汇款及汇费送进柜台上小小窗口里，由那位端坐傲视的邮务员收了过去，逐一检点无讹之后，他才慢吞吞地点点头，说声“你等着！”第三步，他才又慢条斯理地取出双联的汇款票按照汇款数字将同等值的邮票（都要好多张）逐一贴在汇票的骑缝上；然后点数无讹，才又动用长剪刀将之从骑缝处剪断为二；最后又动用蘸水钢笔在汇款单的下半页填写清楚该他填的部分，也用剪刀把横处剪断，上半截连同汇票存根部分粘在一起，寄给收款局去，下半截连同汇票才交还给我。这汇款单下半截便是邮局给我的收据，而汇票则由我装在老师写的家信信封里，封了口，再贴上双挂号的邮票，到另一只窗口去，向另一位端坐傲视的邮务员挂号，取得回执，这才算大功告成！共计费时在三十分钟以上。自然，如果在我前边还有一人也在办汇款，那就按人递加一倍时间了。——这些繁琐的手续我都不怕，它锻炼了我办理事务工作的细心和耐力。但我怕的，或者说最厌恶看到的是那邮务员一本正经而傲然的面孔！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因为邮务员的薪金高，铁饭碗，年老还有养老金等等；再有，就是他们都多少懂得点英文。因为那时的中国邮政还在洋

人管理之下，他们都是吃洋务饭的洋奴罢了！我讨厌他们！

此外，我还以乙组组长身份，有时替老师当“小先生”，教丙组同学的课，这大概是教学实习的意思了。我在同伙中“威望日增”，而同时，我的骄傲情绪也就日见滋长，终至闯下大祸，被我最敬爱的姜老师给予一次空前绝后的严重处罚：打了十记手心！

打手心的原因很简单，我打破了丙组一位小同学的额头。有天下午，姜老师出去了，我正在临帖写大字，——这是我各门功课中最薄弱的一环。我并不怕写字，但怕磨墨。人磨墨也是墨磨人嘛！特别是冬天，水滴上砚台，磨着，磨着，都成了冰屑；夏天，不一会砚台就干了。因此，我磨的墨都不浓，马马虎虎写完一张就算了。名义上我临的是柳公权《玄秘塔》，写的却不知什么体，很蹩脚！这天下午，正赶着补写当天大字时，丙组的几个“小萝卜头”仗着老师不在家，追逐打架闹翻了天，我一再吆喝都不中用，这颇使我这乙组组长威信扫地，一气之下，便提起镇纸前去镇压。但为首的姓李，是我家斜对门卜家鞋店老板的外孙，还在打闹不休，我一气之下，举起镇